

聚焦新作

迟子建长篇小说《白雪乌鸦》

温情是穿透灾难的力量

□陈思

《白雪乌鸦》对于迟子建格外地充满挑战。这是一部以晚清哈尔滨鼠疫为题材的长篇作品,因此,在鼠疫的正面袭击之下,如何限制苦难、如何规划苦难,在文本中延续作家一以贯之的温情路线?某种意义上,这样密集而正面袭来的苦难(鼠疫带来的死亡与恐慌),恰恰是研究迟子建温情风格的最佳标本。从我随手记下的四个关键词,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处理“苦难”的四项技术。

日常化。小说从霜降时分写起。客栈老板王春申一架轻便马车,踢踢踏踏在哈尔滨城内打转。原来他的正妻吴芬和小妾金兰各自偷了汉子——小说从巴音和翟役生这样的引子人物身上,把关系网架起。米店纪永和夫妇、醋店老板周家祖孙、烧锅店主傅百川、秦八碗等小人物排队入场。小说家平缓的叙述一开始就沉落在日常生活轨道上——哈尔滨傅家甸区小市民王春申家的蜚短流长,构成了鼠疫入侵的前奏曲。

日常化的鼠疫,并不完全控制死亡领域。《白雪乌鸦》里,并非所有人死于鼠疫。在疫病高峰期,年老的周于氏,因为孙子的一句笑话竟然活活笑死。秦家老娘同样得养天年,孝子秦八碗剖腹自尽。陈雪卿的土匪男人在被包围之后拔枪自尽,风姿卓绝的糖果店老板自己穿戴着整齐之后从容赴死……日常化,避免将灾难推到极致或过分夸大——鼠疫不是一只笼罩天地的蛮横大手,它必须承认自身的不足,必须与滚滚红尘分享人物的死因。

不仅如此,人物的唏嘘与欢欣,时常溢出疫病的范围。翟役生这样的出官太监,本是文本中社会地位最低者。鼠疫来临时,他的心思始终围绕着吴兰、猫、宫中旧忆以及那条假命根子。疫病高峰期,周耀祖、喜岁乐观地往返于住处与隔离区之间,笑声不断。丑角似的周耀庭,“性”致勃勃,不忘要对日本药房老板娘下手。失去妻妾的王春申,在疫病结束后坐在空荡荡的车上,依旧惦念白俄女歌唱家谢尼科娃。

克制。描写一种罕见的灾变,需要奔逸的想象力,也需要控制想象的知性缰绳。迟子建并没有过多放纵对灾难的

自由联想,而是极力控制其杀伤力,甚至有意将之遮蔽起来。

死人的面容,缺乏细致的描绘。小说前段巴音的死,已然是全篇为数不多的直接表现死亡的场景——却也不是“面色青紫,口鼻有血迹,眼睛虽然睁着,但眼珠一转不转”。在迷恋死亡、畸形、残暴的当代文坛,这样的克制,是否格外抢眼?

无独有偶,小说刻意回避主要人物的死亡场面。作家不是挖空心思去分别勾勒喜岁、周耀祖的死,金兰、继宝的死与谢尼科娃的死,而是以极简略的方式一笔带过。陈雪卿的自尽,秦八碗的剖腹,既不香艳,也不血腥。“秦八碗大概怕母亲独自在异乡人群,孤单得慌,剖腹陪伴他娘去了。”概述,显然要比视觉性地呈现剖腹场景要收敛得多。

进一步说,垂死者的心灵空间,被遮蔽了。等死的漫长时间,是求生意志最后的舞台,也是扭曲的人格、蓬勃的欲望以及种种仇恨的策源地。对此当代作家灵感泉涌,逝子建却弃之不顾。她并不进入这些可怜生物内心世界,无论是喜岁、金兰,或者秦八碗、谢尼科娃,都是暗哑的。在这一点上,我个人认为多少值得商榷。

相对于描写死前发黑的面部、扭曲的身体与挣扎的灵魂,作家更喜欢走笔于晚清哈尔滨的城市空间。小说第一、二、三、五六章,均以大段的风景描写为开端。抒情的运笔,让这些空间具有格外动人的意味,好处在干冲淡尸体的呈现,也打断了死亡主题的过分持续。

我们的疑问也随之出现。疫病院、隔离区以及最后藏着鼠疫病人的恐怖的教堂,是小说中屡次提及,却并没有“贴近”去写的三处空间(读者仅仅跟随喜岁和伍连德的脚步,有短暂的停留)。事实上,这三处空间仿佛三个黑洞,人只要进去了,就几乎再也没有出来。小说家更愿意长时间停留在“外部”,没有深入那肮脏、阴暗的疾病的巢穴,也就并未完全释放灾难本身的创伤性。

除了场面、心理与城市空间的三重遮蔽外,尚有第四个维度的留白。作家所写的人物表面具有全面性(男女老少、

官员、医生、日本人、俄国人),实则同属衣食无忧的城市中上等收入者。惟一的翟役生在亲人的接济下,不仅满足温饱,亦可时有牙祭。小说围绕客栈老板、醋店老板、粮店老板为柳钉打造的人物关系网,恰恰遗漏了都市贫民这一维度。大灾大疫带来的“大饥”与“大寒”,因为小说对贫困阶级的遮蔽大为弱化。当然,贫民阶级的引入,会不会冲破温情情调,以至于最终威胁到小说需要抵达的结论?这可能是作者更关心的问题。

偿付。小说家驱使鼠疫、灾难或命运夺走的东西,会在文本的结尾处,以某种新的方式回归。比如《逝川》,吉喜大妈孤苦寂寥的晚年,在篇末众人悄悄赠予的泪鱼中,得到了一定的补偿。再比如《白银那》,健硕的卡佳之死无疑是创痛性的,然而村里的和解以及新一代青年的爱情,使逝去的美好重临人间。

《白雪乌鸦》最后一章取名“回春”,鼠疫的冬天过去了——这一象征性的收束,在提示生命与宁静的复归。

伴随结尾出现的,是密集的生育意象。于晴秀——小说中的理想东北女人,顺利生产。新生儿同样取名“喜岁”,为的是纪念死去的儿子。傅家烧锅半疯的老板娘苏秀兰莫名怀孕,遮遮掩掩地延续了秦八碗的血脉,也无形中拯救了濒临倒闭的傅家烧锅。

最后一章所提供的幸福不仅如此。青云书馆的头牌翟芳桂,鼠疫中死了男人,却继承了粮店与陈雪卿的糖果店。粮店储存的大豆帮助中国酱油店站住了脚跟,打击了日本人加藤的吞并野心。其次,王春申的第二任老婆吴二家的,不敢再殴打继英。最后,随着酒桌上的一次招呼,人人轻贱的翟役生终于获得了傅家甸人的接纳。如同新生命的降临一般,翟役生成为了傅家甸的新成员。

小说结尾,王春申拉着空车,行走在逝去的俄国美人曾经的必经之路上,在花圃边他看见谢尼科娃的丈夫已经再娶,新太太是面包店的尼娜。熟悉前文的读者立刻会意——幸亏是谢尼科娃生前喜欢的胖大美人尼娜,而不是令人厌恶的日本人美智子。其实,在与美智子的竞争中尼娜何以胜出,我们不必追究。惟一的合理解释是,

死者长已矣,作者却不忘给予她微薄却实在的补偿——不让她的丈夫投入敌人的怀抱,而是让他娶了一个亡妻认可的女子。

如此婉转、晦暗与慈悲,我不得不说,这是一个迟子建式的结尾。

自我消解。作家在散布“天灾”的同时,故意造成了“人祸”的缺席。鼠疫与日常生活中的其他苦难之间并未形成“滚雪球”的联合效应,相反,却因彼此对抗而解除了部分武装:纪永和与贺威的罪恶的“典妻”计划,因为这两个男人的提前死亡而中止。由于鼠疫的从中作梗,更广泛维度上的中日、中俄关系并未得到有机展开:加藤信夫对傅家烧锅的收购行动,从未成功进行;王春申与俄国移民之间的关系,略嫌潦草。因为“人祸”的缺席,作家笔下的苦难尽管已经具备了时间的绵延性与持久性,然而稍纵即逝。

另一方面,“恐惧”与“欲望”的缺席,也构成了灾难的“自我消解”。也许有一批评论家会津津乐道于迟子建笔下人物的从容淡定。的确,鼠疫并非生活的全部,疫病可以染黑他们僵死的脸,却不能让尊严的心停止搏动。问题在于,过早抵达的从容,会不会使迟子建小说中的灾难从诞生起,就面临取消的命运?

恐惧,是灾难的左手——叙事强度的维持,需要人物恐惧感的定时哺育。欲望,是灾难叙事的右手——人物求生的欲求,是激化灾难的必要条件。《白鹿原》的人们燃烧着怕与爱,无论是食、是权或者性,这都为他们彼此之间的倾轧绞杀与各色不幸提供了丰沛的动机。迟子建的处理方式却截然不同:“这是老天往回收人呢。人拗得过天吗?”金兰说完,吩咐王春申多抱点柴火进来,说是吴二家的牛是老牛,估计得费柴火。

是“坚韧”也好,是“隐忍”也罢。一个即将死去的人物告诉你,这不过是“老天往回收人”,不必大惊小怪,也不必小题大做。

小说家有意识地将苦难拉近“日常化”的层面,特意“遮蔽”苦难某些创痛性的棱角,积极主动地“偿付”温情,却在不知不觉中,对苦难事先进行了“自我消解”。这样的“温情”无疑维系了小说家的风格,亦创造了灾难叙事中少见的温婉一脉。无疑,这是小说家又一次成功的文学尝试。

只是面对鼠疫这样恐怖而莫可名状的巨大灾难,“温情”是否会削平题材内在的独特性?过分对视角进行限制,会否掩盖贫困阶层在灾变之中的真实处境与独特光辉?当然,这又是另外的问题了。

读到王重旭的杂文集《中国历史的屈辱》,不觉眼睛为之一亮;这么多精彩的翻案文章!

王重旭文章的突出特点,是思想犀利、剖析深刻。王重旭最喜做翻案文章,一反过去的某些历史结论,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思维定势。王重旭的翻案,不是搞噱头、故作惊人之语,吸引读者眼球。他是厚积薄发,有备而来,在学术上做了扎实的准备的。所以对既有结论的轰炸,火力充足,颇具毁灭性。立新论,同样因为基础扎实,因而坚不可摧。读了他的文章,人们不得不佩服他学养的厚实、目光的深邃、见解的新锐。

在中国,关于仙女爱上穷小子的故事,不胜枚举。千百年来,人们津津有味地传诵这些故事,艳羡这些穷小子的艳福,得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。王重旭一出,价值判断彻底颠覆!王重旭在《穷小子与仙妻》中指出:“多年来,我们一直都沉醉在这种虚幻的爱情故事之中,其实它一点都不美丽,因为这是典型的懒汉文化,弱者文化,庸者文化,丧失文化,让人羞耻的文化,这种文化对我们民族的戕害是巨大的。这些穷小子们没有志气,没有本事,不思进取,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别人身上,靠的是别人的施舍、怜悯、同情和救济,骨头是软的。”从人们司空见惯的民间故事中,透视出“穷小子不知耻文化”长时间以来对民族精神的腐蚀,这不是有振聋发聩之效吗?

王重旭对“史有定论”的事物敢于提出挑战。长城是中国人最引以为自豪的物件。王重旭在《冬日长城》中对长城的功用作了评估,他指出,长城基本上没有什么用,只剩下了警示的意义,那就是“任何一个统治者,不管其是以国家的利益,还是民族的大业为借口,只要是不是不顾国力、不顾人民死活、劳民伤财、大兴土木,都只能落得一个‘城未毕也,而秦已亡’的悲惨结局。”追昔

短评

喜读翻案好文章

□李下

抚今,王重旭所指,又何止是长城!

在梳理若明若暗的历史的过程中,王重旭也能给我们带来新启迪。圆明园是英法两个强盗抢光烧光的。进一步追问,这些强盗为什么要烧圆明园?大多数人就说不清楚了。当王重旭在《圆明园被毁真相》中带领我们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的时候,我们发现,圆明园被毁与当时清政府自己的许多蠢举有关:既然已经签订了条约,允许人家的公使进驻北京,为什么人家来了还要炮击?还要囚禁、折磨外交谈判的代表?39个谈判代表,弄死了20个,剩下的19个也打得遍体鳞伤。这种不按照国际游戏规则出牌的直接后果,激化了矛盾,招致圆明园的毁灭。英法帝国主义的罪行是要控诉的,但这代替不了对自己国家政府当时的封闭、颟顸、愚昧的反思。

宁波的“天一阁”似乎成了国人无不叹服的一个文化符号。王重旭稍稍往深处追问了一下,我们就被吸引住了。范钦的藏书目的,就颇令人费解。范钦的藏书,谁也不能看,对知识的传播不起作用,连子孙们不少都目不识丁。这种藏书办法对“中国文化史”有什么意义可言?王重旭并没有就此打住,他借题发挥道:“历史典籍对我们真的那么重要吗?为什么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无数典籍的民族,却可以成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民族?”王重旭进而探讨我们跟范钦的后人

有没有区别。范钦的后人“不知道自己守护的东西究竟是什么,而我们又何尝知道,我们竭尽一生所守护的东西又是什么呢?”王重旭的醉翁之意已经不在酒了。

王重旭杂文的另一个突出特点,是渗透全部作品中的高尚的悲悯情怀。细读王重旭的文章,我们常会感到有一股热流涌动,这就是作者对党、对人民的赤胆忠心,对祖国、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热爱,以及对普通人性的高尚悲悯情怀。在《21世纪广场的梦魔》一文中,王重旭提出了“炉火法则”,主张让以身试火的人都先烫一烫,以免受到更大伤害。他超越了对贪官的痛恨和贪官受到惩治的快意,能理智地看到“这些贪官同样是受害者”,“假如我们能在他们刚刚伸手的时候,就揍他一下,他还会丢掉性命吗?”进而主张纪委的办案人员把聪明才智用到事前的监督上,而非事后的惩治上。这种难得可贵的对义愤情感的超越,使王重旭能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,宏观地、冷静地思考腐败问题。

王重旭的杂文思想含量颇高,分量较重。究其原因,我认为,主要是他倾注的力量多。王重旭有些文章写得很慢,很艰苦。据他自己讲,有的文章要写上几个月乃至半年。王重旭写作的准备工作之扎实、之缜密也令人印象深刻。他为了搞清一个历史问题,查阅、搜集大量的资料。我印象很深的,像圆明园、莫高窟、长城、苏轼还有“小人”的资料,都详尽得让人叹为观止。王重旭还有绝的,他坚持要把能看的写作对象都看一看,甚至反复地看看。天一阁走了一趟,觉得不够劲儿,就又去了一趟。至于圆明园,虽然过去,但为了体验情绪,寻找感觉,还是专程跑到北京重游一次。这种写作方式,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,在许多人都很浮躁的今天,不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吗?

北京文学·中篇小说月报

2010年第十一期要目

白猫(原载《人民文学》2010年第10期)·····东紫
挣扎(原载《时代文学》2010年第9期)·····季栋梁
陈谷子·烂芝麻(原载《江南》2010年第5期)·····李治邦
再生(原载《花城》2010年第5期)·····王裸
玉石(原载《清明》2010年第5期)·····丁邦文
后绿卡族(原载《滇池》2010年第9期)·····兰芳

特别推荐 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作品精选

如读者在当地买不到本刊,可汇款到我社发行部邮购(免邮费)。全国各大中城市主要报刊亭有售。请读者注意订阅明年杂志:每期一百五十二页定价8.00元,全年十二期定价96.00元,邮发代号:82-106。全国最实惠的文学选刊。地址:北京市前门西大街97号北京文学月刊社。电话:010-66031108。

欢迎到各地邮局订阅或到本刊邮购。邮发代号:84-12,12.00元/期,双月刊,全年六期72.00元。邮购免收邮费。

地址: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69号海南广

场1号楼六层《天涯》杂志社。邮编:570203。

电话:0898-65360004、65332803。

作家立场 重说道德·····韩少功

熟悉的陌生人·····潘家恩

无限延伸的钢轨·····夏榆

谁高兴?谁不高兴?·····杨早

鲁迅与胡适的无间道·····曾子炳

小品录:沈睿·石文颖等

驻派出所调解员日记(2007)王顺健

父亲生平情况寻访资料一束(2004—2005)·····郑邦根

文学期刊主编竞聘演讲(2006)·····宁珍志

老人(小说)·····李永亮

在夜行的火车上(小说)·····雷默

妹妹(小说)·····默

大峡谷(散文)·····阿贝尔

散文一束:耿立·雪松等

后技术时代草根艺术与主流文化的碰撞·····刘海波·戴怡

回族宴席曲:渐行渐远的背影·····马有福

反帝,与反帝之难·····赵刚

自然的界定与道德救赎·····刘宰民

留下真实的历

贺捷生

刘秉荣同志的作品集《赞歌·箴言》出版了,我为此表示祝贺。

明年是建党90周年。我对秉荣同志说,建党90周年了,我们要为纪念党的生日做些事情。秉荣同志提出把他从1980年以来撰写的有关父亲业绩和歌颂老一辈革命家的作品整理出版,我很赞成。当他把他在报刊发表的作品给我看时,我感到秉荣同志多年来不仅为红军唱赞歌,为老一辈革命家唱赞歌,也写了许多歌颂武警官兵(包括解放军指战员)的作品,这些作品字里行间都表露着他对他官兵们的无限热爱。他塑造了许许多多官兵们的光辉形象,这些形象继承和发扬着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,跳动着时代的脉搏。为此,我建议他把这部作品集内容扩大,不仅有反映老一辈革命家的内容,也有改革开放今天官兵们的形象,使人看到人民军队的建设正一脉相承,人民军队和党的事业后继有人。秉荣同志遵从了我的意见,他把书名定为《赞歌·箴言》。他说他的作品为老一辈革命家唱赞歌,为官兵唱赞歌,为祖国大好河山唱赞歌,也写出了喻世、醒世、劝世的箴言,因此定名《赞歌·箴言》。

秉荣同志是位勤奋的作家。多年来,他默默耕耘,颂扬着党和人民军队,特别是武警官兵的功绩。他先后出版了60多部著作和数百篇中短篇文学作品,总字数达4000余万字。据我所知,他的创作成果,在全军作家中名列第一。他的作品格调高昂,通俗易懂,为广大读者所喜爱。国家图书馆和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了他的全部著作。

我与秉荣同志相识于1980年。1980年6月总参谋部《贺龙传》编写组成立时,他由北京军区宣传部调到了编写组工作。他对工作认真负责,对同志真诚坦荡。1983年,他创作了长篇评书《菜刀记》,这是写我父亲早期革命的作品,在广播电台播出后,反响很大。此后,他怀着对老一辈革命家的崇敬之情,积极写作。先后出版了多部颂扬我父亲丰功伟绩的长篇著作,计有《菜刀记》《反南昌》《贺龙演义》《福将贺龙》《洪湖血浪》《神龙元帅》《喋血洪湖》《贺龙大传》(3卷)、《洪湖曲》《贺龙姐弟》《贺龙元帅》《建国后的贺龙》《贺龙全传》(4卷)。其中《洪湖曲》获全军第五届图书奖。《贺龙全传》经单田芳先生录制成评书后,在全国800多家电台进行了长达两年的播讲,反响强烈。这些作品的出版,不仅宣传了我父亲和红军,还抢救挖掘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党史、军史史料。从1980年至今,秉荣同志潜心研究我父亲的业绩近30年,他已成为